

# 反對派充當「普選殺手」要害何在？

楊志紅 全國政協委員 港區婦聯代表聯誼會會長



楊志紅

自稱「民主派」的反對派為何要充當「普選殺手」，成為不折不扣的「反民主派」？要害是反對派害怕見到特首有500萬民意授權，屆時反對派自己的政治空間就會大大縮小，無法再任意抨擊特首選舉是「小圈子」選舉，無法再以爭取普選為幌子招搖過市，所以他們根本不想香港能普選特首。

特首梁振英強調，特區政府會根據香港憲制安排、香港基本法規定、全國人大常委會有關的決定，向立法會提交普選方案，若反對派否決方案，就是「普選殺手」。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譚志源日前亦表示，若自稱是「民主派」的反對派堅持反對得到市民支持，「我都要重新考慮一下，以後叫他們做『民主派』抑或是『反民主派』。」

## 反對派為何違反邏輯及政治倫理

根據多個民意調查結果，有六成民意都認為應接受特區政府根據人大決定提出的政改方案。反對派立法會議員平日裡口口聲聲爭取普選，但卻聲言杯葛第二輪政改諮詢，而且必定否決政府的任何政改方案。譚志源指看不到當中的邏輯及政治倫理。自稱「民主派」的反對派議員要充當「普選殺手」，的確違反邏輯及政治倫理，其中要害何在？

要害在於，立法會議員分區直選，每個選區均採用比例代表制，以最大餘額法及黑爾數額點票。隨着選區議席增加，當選的門檻愈來愈低，以2012年的立法會選舉

為例，在五大選區，香港島、九龍東、九龍西、新界東和新界西，最後一個當選議席的得票率分別為8.3%、13.5%、14.9%、6.16%及6.77%。例如新民主同盟的范國威是2012年立法會選舉最低票當選的議員，得票僅28,621票，得票率為6.16%。

## 反對派害怕特首有500萬民意授權

分區直選產生的議員有一定代表性，但功能代表制亦具有廣泛代表性。反對派議員其實是混淆了特首選舉委員會選舉和立法會議員分區直選的區別。香港目前的選舉委員會採取的是功能代表制，1200位委員分別來自工商、金融界，專業界，勞工、社會服務、宗教等界，立法會議員、區域性組織代表、香港地區全國人大代表、香港地區全國政協委員的代表等四個界別，每界別300人。選舉委員會具有廣泛代表性，其票值與分區直選票值絕對不可相提並論，反對派議員混淆其中區別，意在貶低選舉委員會選舉。

一旦落實普選，不再由1200人的選舉委員會選出

特首，而是由參照選舉委員會組成的提名委員會提名特首候選人，讓500萬名合資格選民於2017年開始以「一人一票」選出行政長官，普選特首的得票動輒以幾百萬計，屆時反對派若再給特首取花名為「幾百萬特首」，那就凸顯只得數萬票的反對派議員根本沒有資格自詡得到的民意授權比特首大，因此，「反民主派」最不喜歡見到的就是特首有500萬民意授權，屆時反對派自己的政治空間就會大大縮小，所以他們根本不想香港能普選特首，要千方百計剝奪500萬名合資格選民普選行政長官的機會。

反對派抨擊特首選舉是小圈子選舉，打着爭取普選的旗號出來攪局，罔顧「一人一票」就是普選的常識，聲稱「一人一票」不是真正的普選，信誓旦旦稱虛無縹緲的「國際標準」才叫「真普選」，這是「揣着明白裝糊塗」。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張德江曾引用諺語說：在市場上吹噓聲聲最大的，往往是賣假貨的。反對派將「國際標準」、「真普選」、「公民提名」、「政黨提名」等口號叫得很響很大，但其內容本質上都是違反基本法和人大決定的「假貨」，他們的這種伎倆就像在市場上賣假貨的吹噓聲。

## 一人一票即普選

香港特首普選，最重要的內容是所有合資格選民可以「一人一票」選特首。由1200人的選舉委員會發展

到500多萬合資格選民「一人一票」選出特首人選。這是香港民主發展的歷史性飛躍。2017年普選的最大意義，就是落實「一人一票」選特首。

事實上，美國國家安全顧問蘇珊賴斯2014年9月10日訪問中國，在與國家主席習近平會面時，賴斯亦明確表示，美國認為提出普選議題是重要的事，而對美國來說，普選是指「一人一票」。(原文：Hong Kong did come up, and it was important for us to raise universal suffrage. For us, that means one-man, one-vote.) 賴斯的表態無疑是對香港反對派所謂「真普選」的反諷，連他們幕後的老闆也認同「一人一票即普選」，認同人大常委會的決定，香港反對派還要吹噓什麼呢？

在香港民主發展的關鍵時刻，如果反對派對主流民意置若罔聞，一意孤行否決根據人大決定制定的政改方案，將剝奪市民的普選權利。而且，香港錯失的將不僅僅是一次民主發展的機遇，香港可能因此而錯失的發展機遇是不可能重新來過的。自稱「民主派」的反對派如果否決特區政府根據人大8·31決定提出的「一人一票」政改方案，他們必須承擔扼殺香港普選的全部歷史責任。

# 釐清關係 以正視聽

林健鋒 立法會議員

# 美蘇敗走阿富汗 中國當和平使者

劉斯路 資深評論員

行政長官梁振英發表了新一年的施政報告，與過往兩年不同的是，特首在今年施政報告引言部分，特別指出中央與香港之間的關係。一定程度上來說，是回應「佔領」之後，香港重新發展，各界所需要正視的「大前提」。只有認清香港是國家一個特別行政區的事實，在這個「大前提」下推進民主、發展經濟、改善民生，才最符合香港市民以及國家的整體利益。

在施政報告引言部分，特首直接了當指出，無論發展經濟還是推動民主，香港社會及市民都需要正視中央與香港的關係。在「一國兩制」下，香港是國家的一個特別行政區，中央和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關係由香港基本法具體規定。香港的「高度自治」的權力來源於中央，中央透過基本法授權香港，香港在「一國兩制」下的「自治」是「高度自治」，不是「絕對自治」，是根據基本法具體規定的高度自治，不是隨意的自治。

在過往一年，社會就政制發展存在不少爭拗，在某些學者、學生團體及反對派政黨的鼓動下，發生了違法「佔領」行動，導致不少市民的正常生活受到干擾，工商業受到打擊，社會意見分歧並撕裂，對本港社會穩定、有利營商的國際形象構成影響。一些反對派人士甚至利用違法「佔領」行動，撕裂社會，離開市民與特區政府甚至中央政府的關係，其背後目的是添磚添瓦，挑戰中央權威，還是想顛覆國家政權？相信他們自己心中有數。

這些人刻意將「一國」與「兩制」分開理解，認為高度自治就應該「河水不犯井水」，甚至不斷膨脹「兩制」的觀念而忽略「一國」主體。這些言論及思考，雖然並非目前主流民意，但卻有不斷延伸之勢，在網絡上、在出版的書籍上、在學術界甚至在立法會內，我們亦不難發現宣揚所謂「城邦論」、「全民制憲」、「命運自決」等蹤跡。

因此，特首透過施政報告點出重點，是希望各界及各階層市民，警惕社會上不斷蔓延的不正之風。香港是「一國」之下的特別行政區，破壞「一國」完整、動搖「一國」憲制地位的事，無論對於香港還是對於市民來說，都是危險的。

去年六月，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發表《「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白皮書。一個側面反映中央的危機意識，警惕香港有人刻意誤讀「一國兩制」。要知道，這些做法不僅是對「一國兩制」方針的破壞、對香港安定繁榮的擾亂，亦是在國際政治角力下，對中國政府的惡意攻擊。

過去一年，在特首普選問題中，就有人提出「公民提名」這些不符合基本法及人大相關決定的主張；在民生問題中，就有人提出要特區政府收回單程證審批權；甚至在立法會內，亦有議員提出動議辯論中英聯合聲明效力，以及英國國會外事務委員會成員考察中英聯合聲明落實情況等事宜。他們認為「高度自治」就是「有權這樣做」，正正反映他們將「一國」的前提完全拋諸腦後的觀念。

特首在施政報告中，釐清一些對「一國兩制」、高度自治的誤解，是防患未然，以正視聽。令港人切合史實，明確香港在國家之中的定位，讓香港繼續保持繁榮穩定。



林健鋒

# 自由有底線 「港獨」思潮不能漠視

鍾樹根 立法會議員

特首梁振英在今年施政報告內破天荒點名批評港大學生會刊物《學苑》鼓吹「港獨」思想，在社會上引發一連串討論。究竟「言論自由」、「學術自由」是否凌駕一切，不應設有任何禁忌區域、不需要遵守道德底線？筆者認為，任何自由都應設有底線，否則將變成放縱，更何況港大學生會所鼓吹的「港獨」，根本不是純粹從學術層面出發，而是已經活生生地體現於去年9月的「佔領」行動中。故特首要全社會警惕這些「毒豆」思潮，並非無的放矢。

環顧全球，即使如英美歐洲等西方國家，對言論自由或學術自由也設有一定限制，不可能無所不談，例如歐洲多國在二戰後相繼立法禁止宣揚和讚頌納粹主義和法西斯主義，另外諸如挑起種族歧視、宗教仇恨、暴力主張或分離主義等話語，亦在不同國家視為禁忌；美國自911恐襲後，談及阿爾蓋達、塔利班、拉登等詞彙，在互聯網上也成為禁忌，可見言論自由並非絕對。而在學術研究層面，也不是所有課題都可以自由進行，諸如改變生物基因、複製動物甚至複製人類等，都受到嚴密監管，必須取得批准方可進行。

## 言論自由並非沒有底線

由此可見，港大學生會嘗試用學術研究作為幌子，實質暗渡陳倉研究「港獨」策略，並不代表政府及公眾不能監管和禁止。更何況港大學生會的「港獨」思潮，已經在去年的「佔領」行動中付諸實行和宣揚，如學聯和「學民思潮」多次鼓吹「命運自決」、「自己香港自己救」、「香港問題香港解決」等口號；而「佔中」發起人更收受外國資金以支持「佔領」行動，又邀請英國下議院議員訪港，藉「監察」中英聯合聲明實施為由，實質干預香港內政和普選進程。

基本法開宗明義第一條是「香港特別行政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離的部分」，可見基本法內一切賦予港人民主自由權利的條文，都是建基於「一國」的前提下。惟港大學生會刊物卻公然鼓吹「香港民主獨立」，大搞分離主義，並已跳出文字研究的範疇，進入了實際可行性研究的領域，例如他們已開始探討香港可以透過「武裝起義」、「外國勢力扶

植」等模式實現「獨立」；如何爭取外國支持及承認；如何聯繫「台獨」、「藏獨」和「疆獨」等分離勢力；如何利用美日以牽制中國；如何建立「香港陸軍」、「香港國」等等，真是「是可忍，孰不可忍」。港大學生會代表還搬出校友孫中山先生來辯解，但孫中山當年反清的口號是「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如今周永康、戴耀廷等「港大人」卻是「逢迎外力，驅逐中華」，這是何等諷刺！

## 做好國民教育和中史教育

港大學生會出版了一本名為《香港民族論》的書籍，但堂堂大學生竟然連如何界定「民族」也不懂，實在令人扼腕。事實上，香港人是中華民族一分子，即使經歷156年英治也不代表已成為另一民族，因此香港民族要「獨立」之說，根本是子虛烏有。大學生連基本歷史知識亦欠奉，更令人覺得中史教育有提升及必修的需要。

參考以往多宗涉及港大的政治事件，包括港大研中心的身份認同偽命題民調、港大法律系副教授戴耀廷收受匿名捐款支持「佔中」，再加上今次港大學生會鼓吹「港獨」風波等，可見港大內部有可能已出現一個由教職員及學生組成的「港獨反華集團」，專門策劃和從事勾結外國勢力和反華反特區的行動。其事態之嚴重，已引起中央及特首關注，故不得不在今年的施政報告內點名提及，以呼籲各界一同警惕。

「港獨」思想現時在香港只有極少數人認同，但卻可能為香港帶來大禍，港府必須防微杜漸，盡快做好國民教育和中史教育的工作，莫讓「港獨」勢力暗中坐大。



鍾樹根

不論美國和前蘇聯怎麼看，阿富汗的塔利班都要在世界軍事史上留下一頁。也許，美蘇都不承認戰敗於塔利班手下，但事實是這兩個超級大國都沒能剿滅塔利班的軍事力量。值得強調的是，塔利班不管如何定性，都不能等同於拉登的基地組織。事實上，美國在計劃從阿富汗撤兵之前，一直都有與塔利班接觸，視其為謀求阿富汗和平的一方力量。

在美軍決定撤出阿富汗之前，國際社會已討論過「誰繼續維持阿富汗秩序」的問題，其中有意見認為，中國「不能再搭美國的便車」，北京作為利益攸關方，很應該出兵阿富汗維持和平。現在，對此問題有了最新的答案，中國正扮演阿富汗和平的魯仲連。上月，塔利班一個代表團訪問中國，就與阿富汗政府展開對話的可能性進行討論。當然，由此達成阿富汗和平，北京應可得到諾貝爾和平獎。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表示，作為阿富汗的友好鄰邦，中國希望阿富汗早日實現持久和平。北京支持「阿人主導、阿人所有」的和平與和解進程，願為此發揮建設性作用。據悉，中國將自身定位於為和解進程提供支持。

到訪北京的塔利班代表團，已提出一些談判條件，如修改阿富汗憲法、允許塔利班參與政府管理部門，他們明確請求中國承擔調停角色。對此，美國國防部則說，美國歷來支持由喀布爾牽頭下的政治和解。美國的表態，顯然有些曖昧。他不是直接對北京的參與表態，不說是好是壞，只是強調「喀布爾牽頭」，多多少少說明了美國的尷尬地位。

## 中國有助阿富汗和平

無疑，美軍撤出阿富汗，而由中國接手和平談判，無論從何種角度看，對美國都是一種諷刺。去年中，孫玉璽成為中國首任阿富汗事務特使。和前蘇聯、美國不同的是，中國對阿富汗的影響，不是透過軍事佔領或者依靠武力介入進行政權更迭，而是讓阿富汗共用發展與改革機遇，以勸和促談等方式來施加潛移默化的影響。只是這種方式，在西方媒體和政治家眼裡，可能又被視為「搭便車」。

在阿富汗，北京其實一直與當局進行着廣泛合作，包括和美國一起為阿富汗培養外交官，雙方還在反恐、商務等問題上開展低調而有效的合作，只是這些合作都甚少為外界知悉。中國的戰略目的務實而簡單，即一個和平的、穩定的、發展的阿富汗，不僅有利於阿富汗，也有利於中國西部邊疆，特別是新疆地區經濟社會的穩定與發展。

去年底的中國外事工作會議，首次將周邊外交放在第一位，在美蘇兩個超級大國都敗走阿富汗的背景下，中國的和平進入自然極其引人注目，中國許勝不許敗。尤其，在反恐和實現「一帶一路」的新的戰略構想。首先在國家安全和反恐戰略層面，中國幫助實現阿富汗和平，必然有助於斬斷境內極端勢力和分裂力量與阿富汗境內激進宗教組織的勾連，穩定新疆局勢。其次，在實現「一帶一路」戰略上，阿富汗佔據地理中點，阿富汗和平，有利打通中國向西貫穿歐亞大陸的戰略通道，將中國的西部開發戰略和歐亞戰略內外聯通。當然，最為重要的是，中國有助阿富汗和平，也就是對世界和平的大貢獻。

郭中行 資深評論員

# 梁家傑首鼠兩端遭圍剿

特首梁振英在施政報告點名批評《學苑》煽動「自決」是錯誤的路線後，引起了社會各界熱烈討論。原因是這幾年，本港社會確實掀起了一股「港獨」歪風，有學者、政客、激進派人士肆意鼓吹「獨立建國」，甚至提出「武裝革命」的主張，但有言論不但沒有受到嚴厲批評，反而在所謂「言論自由」的保護傘下在社會上不斷傳播，更衍生出「激進城邦派」以及大量極端「港獨」組織。如果任由「港獨」歪風繼續蔓延，這已經不是言論自由，而是放任自流，縱奸藏邪，對香港禍害深遠。所以，梁振英提醒社會要防範「港獨」散播，是作為特首的應有之義。

而且，「港獨」也是一面照妖鏡，將一眾反對派議員的真面目表露出來。在早前的立法會答問大會上，公民黨梁家傑批評梁振英將施政報告變成「政治鬥爭綱領」，梁家傑更指香港無人搞「港獨」，結果被梁振英反將一軍，反問梁家傑是否支持「港獨」，迫使梁家傑要在立法會上明確表示：「我反對香港獨立。」梁家傑這段「自白」的短片，很快就在網上廣泛傳播，並且引發了大批激進派人士憤怒，紛紛在網上辱罵梁

家傑「有膽做無膽認」、「懦夫」，有激進派人士更揚言要狙擊梁家傑。

## 公民黨愈激自食苦果

事實上，不以人廢言，梁家傑的說法並沒有可批評之理，中國憲法和香港基本法都明確要求維護國家統一和領土完整，在香港特區沒有鼓吹「港獨」的自由，而「港獨」更只會將香港引入死路。任何香港從政人士，不論其政見為何，豈能公開支持「港獨」？所以，梁家傑身為公民黨黨魁明確「反港獨」是正常之極，但何以會引發激進派反感？主要原因是梁家傑及公民黨之流，近年為了開拓票源，不斷靠激進光譜，從中招兵買馬，吸收了一班激進派人士。同時，在「佔中」期間，公民黨也積極與一眾激進派組織包括「港獨」組織「合流」，儼然成為其代言人，意圖與「人民力量」、社民連平分有關票源。因此，梁家傑從政人士大力支持「佔中」所謂的「港人自決」、「命運自主」等「港獨」訴求，更將矛頭指向中央政府，要挑戰中央對香港的管治權。這些行為正正是含有「港獨」趨向。

另一方面，公民黨內不少人一直視中央為敵人，也是不爭事實。不要忘記，2002年12月，梁家傑擔任主席的香港大律師公會，就批評特區政府「沒有最低限度的確認一個推動分裂國家的運動，有可能是一個民族正當地行使民族自決權，並因而構成一個正當的政治訴求」。2005年梁家傑又宣傳香港有所謂從中國分裂出去的「民族自決權」，鼓吹特首不要由中央政府任命。還有2010年違法違憲的「五區公投」，再加上陳家洛等受美國青睞的「顏色革命」專家身居高位，公民黨難道能與「港獨」劃清界線嗎？不過，梁家傑也知道「港獨」不得人心，吸納到激進派卻失去了整個中間派選民，自然不敢大張旗鼓。於是在梁振英質問下，只有表態不支持「港獨」。

誰知道這一表態卻暴露了公民黨的投機黨格，不但廣大市民質疑，更引起與公民黨「並肩作戰」多時的激進派不滿，認為梁家傑「出賣」了他們，在「港獨」成為眾矢之的時候沒有施以援手，反而落井下石，於是對梁家傑發動圍剿。公民黨陷入左右不是人的處境，怪不了別人，只能怪他們首鼠兩端的黨格以及禍港的險惡用心而已。